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Peter J. Katzenstein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世界市场中的小国家

——欧洲的产业政策

[美]彼得·J.卡岑斯坦 著/叶静 译

世界市场中的小国家 ——欧洲的产业政策

[美]彼得·J.卡岑斯坦 著 叶静 译

Small States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Peter J. Katzenstein

当代西方学术文库·比较政治经济学书系 主编/朱天飏 执行主编/曹海军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ndustrial Policy in Europe by Peter J.Katzenstei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85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via Beijing Sourcebook Agency.

国家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08-30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市场中的小国家：欧洲的产业政策 / (美) 卡岑斯坦著；叶静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9

(当代西方学术文库)

ISBN 978-7-5463-0248-5

I. 世… II. ①卡…②叶… III. 产业政策 - 研究 - 欧洲
IV. F15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58512号

书 名：世界市场中的小国家——欧洲的产业政策
编 著：[美]彼得·J. 卡岑斯坦
译 著：叶 静
出 品 人：周殿富
总 策 划：崔文辉
策划编辑：曹海军
责任编辑：史 宁
封面设计：SDDoffice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650mm×960mm 1/16
印 张：19.75
版 次：2009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0248-5
定 价：32.0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发行部负责退换)

前 言

——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

朱天飏

2001年末我参加清华大学组织的试讲时，题目就是“什么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看到听讲教师们一脸茫然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无论是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还是后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第一次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生课程时，都用“政府与市场”作为课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课时也是要把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融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课里讲。但几年过去，形势已有所不同，我于2006年初出版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而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开设以“比较政治经济学”为课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已经成为常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清华大学的曹海军老师建议和推动，吉林出版集团决定出版这套经典译丛。

比较政治经济学不为人所知完全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崭新的领域或边缘领域。比较政治经济学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和市场的关系来探讨国家怎样管理经济事务。其实这个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人每天的生活，也几乎是大众话题。跨时空比较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关系应该说早就有了，但真正成为系统的研究领域还是20世纪后半期的事。肖恩菲尔德(Shonfield)于1965年出版《现代资本主义(Modern Capitalism)》一书，将发达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与它们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相连接，开创了当代比较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先河。后来学者们对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应对政策的

研究更系统地比较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更深入地分析了经济调整背后的政经互动及其模式,于是开创了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现在,比较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多方法(如比较历史分析和理性选择分析)、跨地区(不仅是发达地区还有后开发地区和转型地区)和跨时间(如早期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当代全球化的政经影响等问题)的研究领域。

当然,正是因为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铺开面很广,反而难以成形。这点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相比最能说明问题。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领域都开创于20世纪70年代对石油危机之影响的研究。前者思考石油危机与美国的衰落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影响,后者分析不同国家对石油危机的应对之策及其背后的政经互动。概括地说,前者探讨国际政治体系怎样影响国际经济事务,后者则比较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的政府、利益集团、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研究的是国家间的关系,另一个则是国家间的比较。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政治学的一部分,理论层次的争论虽然激烈,但都被整个领域所接受;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经常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研究一个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很少与研究其他地区或主题的学者对话,因此缺少几个能够为整个领域所接受的理论范式。我想我开设比较政治经济学课程、编写教材和主编经典译丛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将这个领域整个展示给大家。

如上所述,比较政治经济学是对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关系的跨时空比较。政府、利益集团与市场也可以放大成为宏观的国家、社会与经济,而国家既是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常用的概念,又是一个最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国家至少有国际、国内和个人三个层次的含义。在国际层次,国家指的是“主权国家”,代表领土内人与物的总体,与其相对的是其他国家;在国内层次,国家是指由全职的官员组成和管理的一系列机构,对一定固定领土上的民众行使统治并垄断这个领土范围内的暴力工具,与其相对的是其统治的民众所在的社会;在个人层次,国家是政治家和官僚等个体组成的政府统治集团,与其相对的是其他个体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应该说,国际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国家主要是指国际层次的国家,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则主要在国内和个人层次上,特别是国内层次。

对国家概念清楚的理解不仅有利于我们读好比较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也有利于我们理解中国在不同层次上所面对的不同问题。比较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国家、社会与经济的关系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题。如何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的关键。希望这套经典译丛的出版不仅能够促进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在中国的成形和发展,同时也能够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事业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这套丛书开始的选题计划和最后的审校都由我承担(个别非我审校的译著会明确标出审校者姓名)。我希望在此感谢曹海军老师。没有他的倡议和推动,这套丛书是不可能有的。曹老师作为执行主编还承担着很多具体事务性的工作。他耐心细致、温文尔雅,从容解决了各种问题,使我能够专注于丛书的审校。也要感谢吉林出版集团积极推动和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特别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崔文辉先生的大力支持。最后,我要感谢在我比较政治经济学课上学习的所有“孩子”,他们是我在中国推广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永久动力。

2007 年末

于北京大学廖凯原楼

前 言

——变化世界中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

彼得·J.卡岑斯坦

国家与资本主义是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基本建构材料。这里有两种思考问题的线索。一些学者倾向于对政治结果的经济解释,运用供给或者需求等经济变量来解释选举或者对外贸易等与政治相关的结果;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发展对经济结果的政治解释,例如,商业集团、劳工集团和国家这三者的力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非常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这两种视角可以用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概念来说明。基于国家固定的资源禀赋的假设,比较优势概念是新古典经济学贸易理论的基础。根据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的观点,如果国家能够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而不只是绝对优势,国际劳动分工就可以给所有人带来最大的收益。但是,就像弗雷德里克·李斯特(Friedrich List)和其他批评者指出的那样,比较优势概念存在着重要缺陷。这个理论只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静态分析。按照它的逻辑,葡萄牙无论在1780年、1880年,还是在1980年就只能生产酒,而英格兰则可以根据比较优势学说从1780年生产服装提升到1880年生产重型机械,并再提升到1980年生产计算机芯片,从而因生产类型的提高在生产效率和经济福利上收获巨大。比较优势学说因此固化了一系列用市场语言来表达的政治关系,并且支持了那些导致各国经济不断趋异的政策。

对这个传统经济学概念的挑战来源于对竞争优势的一种明确的政治解释。根据这个观点,无论是葡萄牙的太阳还是英国的资本,每个国

家并不持有固定的资源禀赋。相反,竞争优势学说假设,每个国家经济都在努力增加它们的资本存量、加强它们劳工的技术基础以及促进科技知识在创造新产品和新生产程序过程中的应用。在过去两代人的努力下,亚洲的发展型资本主义成为竞争优势的大展示。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探讨国家兴衰、寻求解读动荡变迁的领域。

上述两种视点面临着同一个学术挑战:如何将观察到的政治或经济结果和政治或经济解释因素联系起来?特别是在两者相距甚远的时候。在他们各自的学科内,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都曾发掘出对经济和政治结果令人注目的解释。但是,在现实世界里,经济市场和政治制度经常紧密相连。这两个学科因此都经历着扩展自己研究范围的冲动,建立在这个冲动上的进一步探索也是人性以及好的学术实践的自然发展。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的认知如何进步呢?因此,学者们不断努力将经济与政治变量融合以获得更强的解释力。

紧随上述学科的融合是有关研究方法的思考。与学科的内涵问题相比,方法问题是次一级的问题。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统计学与案例叙述并不是天生的优劣易辨。现实通过解释被分类并数字化,定量分析方法已经足够先进,能够将定类数据或定序数据转化成定据数据,并运用高级统计技术进行处理。哪一种方法论策略更合适,应该根据面对的问题而定,而不取决于不变的方法论偏好。有些学者认为,研究的科学性只能来源于对国家和大型国际组织提供的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从而得出解释多种现象的规律。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准确和深入的理解需要获得原始数据以及对当事人生活经历的细微理解。这两种观点都有自己的学术局限与限制。自然科学与人文学在现实的时间——不可逆转性、推测性、非线性和非平衡性等特点上是有基本共识的。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大部分定量分析都普遍依赖一般线性模型,其实并不适合用来解释现实的许多重要部分。而另一方面,以案例为中心的定性分析往往忽视对非现实世界的系统质询,无论是通过反事实推理还是通过复杂性理论所提供的模拟方法。因为当代社会科学为我们提供了比用于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多得多的分析方法,那些存在于定量与定性分析支持者之间的方法论争论,特别是孰优孰劣的争论,好像变得无地自容了。

现代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崛起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最早的一批学者集中研究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各种途径适应混合经济与社会福利国家所达成的政治妥协,而这种政治妥协则将西方左、右两派的政治极端势力推向资本主义政治的中心地带。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的国家化政治,60 和 70 年代的统合主义政治,80 和 9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政治都游弋于这个中心的左右。上述每个时期都是重大变迁,每个时期都为当代资本主义的演变增加了一个特殊的制度线索。

同样重要的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化趋势增加了横跨国界的各种经济和社会交流的密度。其实,在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部分,国际世界已变成了全球的概念,对各种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都具有重要影响。在这个新的国际和全球背景里,崭新的资本主义与国家模式开始演化,特别在拉丁美洲、东亚、东南亚以及东欧地区,就连中东和非洲也出现了新模式的萌芽。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比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发展中,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类型在现实中的增加,其分析类型反而变少了。对于研究中国高速发展和新型市场经济的学者来讲,为什么当代学术定式很难在新世纪成功解读中国市场经济的崭新特性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希望新一代的中国学者将这个问题当做一种挑战,努力解释这个市场经济史上的伟大试验。

2007 年末
于康乃尔大学

前 言

西欧的民主小国为社会科学出了一道有趣的难题。以往政治学家仅仅记录这些国家统合主义安排的稳定性,而经济学家常常把该类国家视为经济灵活性和市场竞争的典范。在五年时间中,我一直试图提出一个能够解决这道难题的论点。我所提论点能否成立取决于一定的条件。它主要适用于欧洲的统合主义小国家,这些国家由于经济开放,在 20 世纪世界经济变迁面前一直很脆弱。我认为,政治稳定性和经济灵活性并不相互抵触,而是相互依赖。

工业大国开始体验到经济的日益开放和脆弱,在整个现代历史中,这些状况对于它们来说是全新的,但是在它们的小邻居看来却是家常便饭。在欧洲小国,经济的开放和脆弱使得统合主义安排成为可能,而这种安排在大国并不常见。因此,小国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典范,可用之评判大国的发展。

我写有两本探究欧洲民主小国政治经济的书,本书是其中之一。《世界市场中的小国家》(*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根据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低地国家和中欧国家在一般意义上提出了论点。《统合主义及其变迁》(*Corporatism and Change*)将这个论点具体运用到了奥地利和瑞士。两本书都展示了经济开放和民主统合主义(democratic corporatism)是如何塑造欧洲小国产业调整政策与政治的。

《世界市场中的小国家》认为,20 世纪 30、40 年代环环相扣的危机即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本性地重组了欧洲小

国的政治。【9】期间产生的民主统合主义,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一直为国际自由经济的压力所强化。灵活的经济调整与稳定的政治就是相应的结果。历史解释了为什么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商界与劳工在工业小国要比在工业大国更有可能实现政治妥协。工业革命之前农业和宗教的政治回答了为什么较之大国而言,19 世纪和 20 世纪欧洲小国拥有的是分裂的政治右派和改良的政治左派。此外,在过去两个世纪里,欧洲小国采取了面对出口的专业化战略,试图缩小社会中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差距。并且随着普选权的实行,这些国家选择了比例代表制而不是多数表决制,这表明不同的政治行为体很早就愿意分享权力。

虽然欧洲小国在统合主义安排以及产业调整战略的实质上彼此相似,但是它们的政治模式和政策类型有着明显的不同。现今,统合主义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自由统合主义”,另一种是“社会统合主义”。工业化的时间先后、战时的经历与社会的分工模式,都有助于解释欧洲小国间的这些差异。在一些国家,调整是国际范围的、私人组织的;在一些国家,调整是国家层面的、公共性质的。因此,欧洲小国选择的是结合经济灵活性和政治稳定性、协调国际政治要求与国内政治要求的不同方式。

我认为在这些欧洲小国中,两种统合主义的差异在奥地利和瑞士表现得最为明显。我写《统合主义及其变迁》是希望新手据此就能很好地描绘出两名家族成员;勾勒出奥地利和瑞士的主要特征后,一幅画着两位远房表亲的图画便浮现出来,两人有着料想之中的不同和意料不到的相似点。20 世纪 70 年代,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骄傲地指出他们福利国家的扩展,而瑞士的商人则珍爱他们的自由市场经济。但两国都热衷于寻求共识。我努力抵制住对推测性特征进行比较的诱惑,比如比较瑞士人的勤勉与奥地利人的懒惰,以及抵制住在这些假设基础上创立论点的引诱。相反,我选择了系统性描述,它能够洞察政治的动机和结构,正是这些动机和结构使寻求共识在不同背景中都变得迫切。【10】这种视角对于理解欧洲小国如何应付国际经济至关重要。对于解释中

欧政治的实质和形式也迈出了恰当的一步。

《世界市场中的小国家》在一般意义上提出了论点。在比较工业小国与大国的过程中,它强调了由历史塑造的结构如何使特定的产业调整战略成为可能。因为此论点有过度概括的风险,所以《统合主义及其变迁》增加了对奥地利和瑞士的详细分析。为了更好地理解奥地利和瑞士的政治,我回顾了四个陷入困境的产业最近的历史:瑞士的手表业、奥地利的钢铁业以及这两个国家的纺织业。这四个产业在很多维度上都不同,包括经济变迁的根源、内部差异化过程、典型的经济行为体、产业的政治组织以及它们与其他部门的政治联系。如果这些历史被视为产业政治四个不同的背景,那么它们的不同有助于辨认出政策与政治的长期模式。

这两本书展现了政治中结构和过程是如何互动的。我选择通过不同程度的抽象来全面考虑这种互动的含义。这样做有违政治学中的一些成规。深入地探索复杂的政治现实,能够在理论上澄清区域的特殊性。广泛的比较研究,一般会特意选择与民族文化核心假设相悖的视角去审视现实,从而达到理论上的认识。因为两种方法都服务于各自的目的,所以近些年来社会科学研究的经典都表达了以下愿望:从长期来看,两种方法应该结合起来。在自己马拉松式的工作结束之时,我非常同意这个想法。

我试图学习将具体与普遍结合起来的方法。对于构建奥地利和瑞士政治生活不同部分的联系,对于认识这些部分是如何产生特殊的政治结构,对于理解这些结构是如何在日常政治中加以更新,熟悉细节都是必要的。因此,两本书子标题的相似,便是为了表达我对结合宏观和微观分析层面的兴趣。欧洲小国的产业政策源于不同的结构性约束和机遇。奥地利和瑞士的产业政治,不断地印证了体现在具体选择中的逻辑。因此,两本书认为,在政治与政策紧密联系的过程中,欧洲小国将经济灵活性和政治稳定性协调起来了。【11】

在开展该研究项目时,我依赖的是政治科学中久经考验的方法。

大国与小国的比较、奥地利与瑞士的比较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比较,对于我论点的提出都必不可少。为了了解欧洲小国统合主义结构带来的约束和机遇,我花了大量时间去追踪奥地利和瑞士的政策过程。我花了五年时间广泛地阅读,多次走访奥地利和瑞士,访谈了 80 多位决策者、商人、工会官员、记者与学者。访谈,与其说是我数据的来源,不如说是我向别人学习、论证自己观点和发掘新观点的一种方法。当我无法在书面记录中找到关键的证据时,访谈帮我填补了缺口。在提供不同产业的战后史资料方面,我发现奥地利、瑞士和西德的剪报档案非常有帮助。使用报纸不是没有风险。叔本华(Schopenhauer)曾经说报纸只是历史的二手货,它们总是说错时间。但是报纸提供了非常好的信息,能够让研究者进一步去研究经济生活的政治意义。

这个项目极大地受益于大批同事和朋友的帮助。五年多时间中,他们经常听我讲述,与我讨论,并评点了连我自己都意识到数目过多的草稿。我常常毫无羞愧地剥削他们,采纳他们的想法,消磨他们的耐心。即使当我们意见不一致,他们对我研究的反馈也使我的观点更为明晰。做学问有时候不可避免地单调乏味,而正是这些朋友的帮助赋予了它意义。在学术上,我最感激的是那些真正坐下来阅读我稿子一或两份草稿的人们,这份稿子包括两卷,现在分别出版了。这些人:弗朗西斯·卡斯尔(Francis Castles)、威廉·迪博尔德(William Diebold)、哥斯塔·艾斯平—安德森(Gösta Esping-Andersen)、彼得·古雷维奇(Peter Gourevitch)、杰弗里·哈特(Jeffrey Hart)、托马斯·伊尔根(Thomas Ilgen)、玛丽·卡岑斯坦(Mary Katzenstein)、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戴维·莱廷(David Laitin)、彼得·兰格(Peter Lange)、格哈德·莱姆布鲁克(Gerhard Lehmann)、阿伦·李帕特(Arend Lijphart)、贝恩德·马林(Bernd Martin)、彭佩尔(T. J. Pempel)、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马丁·谢夫特(Martin Scheffer)、玛格丽特·西贝尔(Margret

Sieber)、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和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12】很多同事阅读了那些最后发展出我这两本书中普遍性论点的论文,我也从他们那里收到了很有帮助的评论,他们是罗纳德·布里克曼(Ronald Brickman)、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米里亚姆·戈尔登(Miriam Golden)、彼得·霍尔(Peter Hall)、史蒂文·杰克逊(Steven Jackson)、珍妮·劳克斯(Jeanne Laux)、马丁·利普塞特(Martin Lipset)、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西奥多·洛维(Theodore Lowi)、亨里克·马德森(Henrik Madsen)、彼得·麦克莱兰(Peter McClelland)、桑德拉·彼得森(Sandra Peterson)、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i)、迈克尔·沙莱夫(Michael Shalev)、加布里埃尔·谢费尔(Gabriel Sheffer)、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和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 Wilensky);给予我有益评论的还有我在约翰·鲁杰(John Ruggie)召集的一系列学术讨论会上遇到的那些欧洲学者,他们是巴里·布赞(Barry Buzan)、黑尔格·海姆(Helge Hveem)、格尔德·云尼(Gerd Junne)和阿尔贝托·马蒂内利(Alberto Martinelli);以及我在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的同事,即艾尔弗雷德·卡恩(Alfred Kahn)、纳塔莉·拉姆瑟(Natalie Ramsøy)与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

这个项目在资金上得到了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Grant no. 3—51025)和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 Grant no. RF 77020—87)的支持。这两本书的第一稿是1981至1982年我待在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那一年时间里完成的。我感谢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Grant, no. BNS 76—22943)提供的资金支持。

在过去五年时间中,我的研究也得到了一群康奈尔学生的帮助。我要特别感谢马克·汉森(Mark Hansen)、格蕾琴·里特(Gretchen Ritter)和朗达·沃瑟曼(Rhonda Wassermann)。多萝西·洪(Doro-

thy Hong)、布鲁斯·莱文(Bruce Levine)和戴安娜·苏泽(Diane Sousa)也帮助了我。

在高级研究中心,迪安娜·德扬(Deanna Dejan)、芭芭拉·霍姆斯丹德(Barbara Homestead)和安娜·托尔(Anna Tower)打字完成了这两本书得以成形的第一稿。完全超乎我预料的是,康奈尔大学政府系的工作人员在重新打字完成随后几个版本的时候,仍然与我交谈甚欢。

沃尔特·利平科特(Walter Lippincott)对这个项目很早就表示了兴趣。在随后的阶段里,他提议了出版的安排,我觉得这种安排很合适:两本单独的书、两个相似的子标题和一个序言。约翰·阿克曼(John Ackerman)读了两本书的导论与结论部分,并给予我很有用的编辑建议。不过,我最感谢的是罗杰·海登(Roger Haydon)。在毫无怨言地编辑这两本书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了比他原本想知道的更多有关小国家的东西。对一份很长的稿件如何组织成两本独立的书,他有着超凡的判断力。他的坚持促使我去澄清我的想法,他的标记使我的文章变得整洁,他的处事之道使我保持温和,他的幽默使大部分艰难的工作充满乐趣。

本书的一些材料在两本已经出版的书中出现过。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一些部分,曾在库尔特·斯坦纳(Kurt Steiner)主编的《当代奥地利的传统与创新》(*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 Contemporary Austria*, copyright © 1982 by SPOSS Inc.)中第99至108页的《对经济开放的政治补偿:奥地利与其他欧洲小国的收入政策和公共开支》(*Political Compensation for Economic Openness: Incomes Policy and Public Spending in Austria and Other Small European States*)出现过,这些部分的复制已获得允许。【13】第三章的一部分出现在约翰·鲁吉(John G. Ruggie)主编的《相互依赖的自相矛盾:国家福利与劳动力国际分工》(*The Antinomies of Interdependence: National Welfare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New York: Colum-

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中第 91 至 130 页的《国际经济中的欧洲小国:经济依赖与统合主义政治》(*The Small European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conomic Dependence and Corporatist Politics*),本书对此的使用也已获得授权。

在家里,我得到了所有我所期望得到的支持。我想塔伊(Tai)和苏珊娜(Suzanne)很喜欢这个研究项目。当我去欧洲时,她们吃的比萨增加了;当我回来时,她们盼望着奥地利的紧身连衣裙或是瑞士的巧克力。我把这两本书的第二本献给玛丽,在两代人朝气蓬勃的互动中,她已改变了我的生活。

彼得·J.卡岑斯坦

于纽约州伊萨卡【14】

中文版前言

《小国家》二十年之后

彼得·J. 卡岑斯坦

康奈尔大学

这本写于二十多年前的书就要出中文版了,现在正是对它进行反思的绝好机会^①。我将据本书之后出现的学术著作,借机修订很久以前提出的论点。由于国家规模的差别,本书对中国经济崛起而言没有什么参照性;但从资本主义制度形式的多样性来看,本书与中国是相关的。我曾以《权力与财富之间》(*Between Power and Plenty*)为题比较分析了发达工业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小国家》是对其的一个跟进项目^②。无论《权力与财富之间》有什么优点,它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分类仍然忽略了国家的规模及开放性,也无视于决定国内结构和战略的国际因素^③。而且,该书的历史部分过于概要,并且充满了决定论色彩,将重要的历史时机置于遥远的过去,忽视了连接前后历史时机的选择的顺序。总而言之,我所关注的比较资本主义的概念工具(conceptual ap-

① 这份前言中的有些内容来自于我的一篇文章:Peter J. Katzenstein, "Small States and Small States Revisited", *New Political Economy* 8, 1 (March 2003): 9-30.

② Peter J. Katzenstein, (Ed),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8). 也可见此书中文版:彼得·J. 卡岑斯坦编,陈刚译,《权力与财富之间》,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

③ 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2, No. 4 (1978), pp. 881-912.